

马名超民俗文化论集

敬文范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马名超民俗文化论集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封面题签:钟敬文

封面设计:岳大地

责任编辑:马秀娟

马名超民俗文化论集

Mamingchao Minsuwenhualunji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

哈尔滨市华文电脑激光照排制版

哈尔滨工程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1.25 插页 17

字数:250 000

1997年10月第1版 199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 000

ISBN 7-207-03176-9/I·501 定价:19.80 元

大地同志惠存

马子娟

一九九八年九月十二日



简 历

马名超同志 1924 年 2 月生于辽宁省辽阳县,1945 年毕业于吉林高等师范学校,1948 年参加革命。1952 年在辽东师专文科执教,1953 年调哈尔滨师专中文科任讲师。

1964 年至 1979 年,先后在黑龙江省文化局戏剧工作室、黑龙江省博物馆考古部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黑龙江分会任职。1980 年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聘为副研究员。1981 年起在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任副教授。

马名超同志一直致力于民族、民间文学研究事业,治学严谨,力倡实践,著述、译文及第一手资料逾千万字。北亚史诗带“田野作业方法论”等学术观点在国内及日、苏、芬等国的学术交流中影响广远。

生前任中国民间文学集成黑龙江卷副主编、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黑龙江省民族研究学会副理事长、民主促进会哈尔滨师范大学支部副主任委员等职。

于 1991 年 10 月 2 日病逝,享年 68 岁。

马名超同志,一代师表,风范永存!

为了永不忘却的纪念

——忆挚友马名超先生

乌丙安*

1991年10月9日,我收到了一封苍白色封皮上有黑字黑框的信函,下款打印着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马名超同志治丧委员会”的字样。我确实惊呆了。我无法想象这位满面红光、精神抖擞的“学术铁人”是怎样突然弃世而去的。然而展读讣告短文,才知道我的这位挚友真的已经逝世。当时我正匆匆撰写《中国民间信仰》一书杂神信仰的草稿,被这噩耗几乎完全牵入了神秘的俗信之中,不由自主地为名超先生的忠魂默哀致敬。

东北方陨落了一颗当代中国民俗科学耀眼的巨星!

此后两年多的时间里,无论在台湾进行高山族各族系考察时,还是在日本出席世界民话博览会,或先后又两次在德国进行有关中国北方民俗文化的交流时,我都追忆起与名超先生共同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难忘的往事。无论我在研究生的课堂讲授民俗学课程时,还是伏案读写民俗学文章时,我都常常追忆起与名超先生坦诚无间的挚密交往。我虽然做不到像鲁迅先生那样为哀悼忠魂达到“为了忘却”而纪念的深沉,但是,作为事业上的挚友和知己,情分上的好兄弟,我确实能做到“为了永不忘却”而纪念名超先生!尤其是当他的遗著公开出版之时,这种纪念就更加有意义了!

* 本文作者系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辽宁大学民俗研究中心教授。

真是说来话长。我与名超先生的友情是早在 1956 年的青年时代缔结的。那时，他正在钟敬文教授指导下攻读民间文学研究生课程。我已先他一年于 1955 年从钟师门下研究生班毕业，正在辽宁大学前身的师范学院讲授民间文学。1956 年我又短期返回北京师大再进修，由于我和他都来自祖国东北的原因，自然很快结成了地缘亲情。以后志同道合，性情相近，对学业的追求也极为和谐一致，于是友情加重。从那时起，我俩之间便欢快地互相称起“兄”来。名超先生长我 5 岁，我理当称他为兄。可是，他却偏偏反过来称我为“兄”，令我不安。据他解释说：同师门下受业，只论学辈先后，不论生年长幼；因我先他一届毕业，故而称“兄”。以后只好在“名超兄”与“丙安师兄”的互称中发展我们的友情。再以后，曲折的历史道路和坎坷的生活经历使我俩之间中断了 25 年的往来。80 年代初再聚首时，我已年过半百，他也年近花甲，我们一如既往，亲密如初。此后在通信中他总算郑重地称我为“吾弟”了。但是，在长长的信文中依然不断地戏呼我为“大师兄”，以唤起往昔事业追求中的挚情。

历经沧桑之后，我俩的深厚友情在民间文学事业上才真正开始重建。在几次全国性的民间文学学术研讨活动中，我注意到名超先生在民俗考察和田野作业调查方面，不仅有十分扎实的功底，而且还有一整套的科学理论及较全面系统的科学实践。在我国民间文艺界长期重二手资料，轻实地调查的学风日下的现状里，名超先生的民族民间文化考古的作业，确实为 80 年代复兴的民俗科学事业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经验，其中不乏具有开创性、开拓性意义的科学成果，为国际民俗学交流及开发我国多民族民间文化资源创造了极为丰富的精神财富，并形成了规范。名超先生的杰出贡献在 1986 年到 1989 年间的几次重大国际交流活动中都产生了出色的效应，展现了他在科学实践上的强大优势和无可非议的成功。

最近八年间,我和名超先生的密切合作,主要表现在国际民间文艺学、民俗学的比较研究课题上。1983年1月至1988年夏的五年间,一方面请名超先生就黑龙江赫哲族英雄史诗“伊玛堪”与日本北海道“阿伊奴”族英雄史诗“尤卡拉”进行比较研究,指导在辽宁大学攻读中国民俗学的日本研究生山下纪久枝和桥本文子等留学生。他的指导使日本学生深深地迷恋上了对北方英雄史诗的研究,成功地完成了向日本首次介绍“伊玛堪”的工作,引起了日本学界的极大兴趣和关注;同时,也介绍了名超先生在这个领域的成就。另一个主要方面则是我提出了我和名超先生携手参加中日合作对日本“阿伊奴”史诗与赫哲族史诗进行比较研究的科研课题。1985年我在日本讲学期间与东京民族文化映像研究所所长姬田忠义先生协商开展此项课题的中日合作研究。1986年制定了方案,组成了中方由我和名超先生,日方由国学院大学教授野村纯一与姬田所长组成的研究队伍。1987年在日本丰田文化财团的资助下开始了日中两方面的作业。在进行这个项目的过程中,名超先生做了十分充分而细致的准备,并与日方主持人野村教授建立了融洽、和谐的协作关系。他在比较研究的最初阶段所展现的学识与才华,以及高研究的水平和精湛的汉、日语文水平,博得了日本权威学者异口同声的称赞,被评价为“了不起的国际水平的教授”。双方都期待着合作的成果。1988年夏,我代表中国故事学会邀请名超先生出席了在沈阳召开的国际故事学术讨论会。他在会上会下作了出色的交流,成为这次国际会议最为瞩目的学人之一。在这八年间,于1986年3月,我和名超先生都应邀参加了中国、芬兰联合考察队,以中方带队学者身份分别在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的不同村寨进行民俗调查。名超先生充分运用了他的田野作业科学方法,施展了他超常的工作才能,在他统管的那一片村寨的考察中取得了令人惊羡的成果,受到了中外学者的交口称赞。当时,我和名超先生同

住南宁宾馆的一室中,很得益于他的帮助。尽管1989年以后,中日合作的项目中止了,但是,名超先生在国际交流方面的贡献是突出的。作为合作的亲密伙伴,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为此付出的心血。

在我和名超先生经常协调国际民俗学比较研究与交流的往来中,他对科学事业的热爱和为民族民俗学事业无私奉献的精神,使我深受感动。在我保存的他给我的13封长信中,多次畅谈了北方民族史诗的领域及他所发现的一些重大研究课题。他那种水晶般透明洁净的学术情怀和开敞的学术胸襟,非常令人景仰。在我国学界内耗不断的歪风下,名超先生的优秀品德,使我对他始终保持发自心底的崇敬。

1988年元旦,名超先生照例寄来了贺年信。他写道:“如约,我将尽其所有,倾囊相授,连同脑子里转过的想法。老哥只恨与你相距甚远,这些又非通信所能解决得了的。你这次信所谈的《满都》、萨满信仰等,都是重大课题(还有个通古斯语言的题目也迫使我们不得不去思索)。可惜,目前我还只有这么个思路,但仍破破碎碎地连不成片,还没理出个头尾来,我坚信,那路数总不是牵强的。近日,关于‘摩苏昆’的原始资料即发于《黑龙江民间文学》第17辑,那是很有意思的一份科学资料!如能与西部呼伦贝尔草原的巴尔虎史诗连接起来,你一定会敏锐地涌现出更多的想法来。内中的缺环就是如今内蒙所属的鄂伦春族中尚未发现类似的英雄诗篇的痕迹(想象理应是存在的,而今只见到些变体之类的材料)。这篇文章你可以做,我愿无条件地向你提供。”

这封信除了开端那一句很短的贺年词以外,几乎都是推心置腹的畅谈和慷慨无私的表述。我掂得出这情义无价的分量,它比任何贺礼都更贵重。其实,他关于“史诗带”的构想,早在1986年中芬联合考察期间我们同住一室时就曾连夜叙谈过。那时他总是兴奋不已地勾画着从“伊玛堪”到“摩苏昆”,再到蒙古巴尔

虎英雄诗章的大分布,以及详细的“史诗带”线路。他的许多富于激情的民间艺术科学的闪光之见和论断,至今还在我耳边回响,永不忘却!所以当1988年新年读名超先生这封信后,不久,我的专著《神秘的萨满世界》脱稿了,在名超先生的“史诗带”构思的激励下,我开始设计与名超先生合著《雪国史诗带——北方史诗之路》的方案。1989年早春,我匆匆访日归来便踏上了赴欧洲出席布达佩斯国际民间叙事创作研究协会会员代表大会的旅程。在会上我宣读了《北方民族史诗与萨满教》。以后又赴西德讲授萨满教数月,再经巴黎飞往韩国首都汉城,出席亚洲首届民俗学大会,做了有关萨满教研究的学术报告。返国后,1990年至1991年的大约两年间,我的大部分时间投入到研究生教学和应邀去广东、河北、四川等地的讲学活动中,于是,和名超先生的联系几乎中断了。这几年中,名超先生过早地在工作岗位上退退进进,在体制所限的诸多不便中治学,失去了许多和我携手共进、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的良好机会。凭着他的执著和奉献精神,固守住他在龙江那块研究阵地,锲而不舍地攻克一个个学术难题,同时也留下了一份遗憾!

1988年2月13日夜,名超先生又一次提笔给我写出了贺春节的长信。信中写道:“久不晤面,实在想念得很。一个主要原因,真想知道些咱俩的合作项目究竟进展到怎样地步。年前我去广东从化,疗养归途过京时,正巧是你伴山西团从日本回来返沈阳的第二天。听诸公讲你到中国民协介绍赴日情况时,我真恨一步来迟,失却一个绝好的机缘,悔甚悔甚!民协里一哄哄的,都传乌马二氏‘日本之行,指日可待’了。听闻之下,老哥自然不禁欢喜若狂。”“自从中芬会议过后,经与吾弟当面所谈,有关北方史诗带及文化圈的课题怎样进展,一直怀念在心,并抓紧一切机会做与你偕行的‘假准备’。你想,以老哥这一把年纪和平素所思虑的,能不有焦虑之感?……只是,老哥太过固守,局面就是殊难有

所突进。……仰仗吾弟，期待有成。……老哥实望追随吾弟之后，愿在这方面尽点余年微力，以了平生之夙愿也。”虽然以后在当年夏名超先生与日方合作者野村教授有了较密切的交往，但是1989年间合作项目终于中止。我开始了中德合作科研课题的作业，名超先生继续耕耘他的北亚史诗带的沃土，用以抚慰我俩在某种失落感中所受的心灵创伤。至今，我也无法估计类似这种在学术道路上说不清、道不明的损伤，对名超先生的生命到底有多么重的打击？我作为他的挚友，也无言以对！

在和名超先生的长期交往中，我十分敬佩他那谦虚谨慎的好品质、好作风。尽管我们之间默契多年，彼此本来无所顾忌，但是，和他共参一事时他照例虚怀若谷地自谦、自律、自责、相让；他的成就达到顶峰时，仍争做助手，主动承担幕后任务与台下重担。在他的话语里“老哥为你打下手”，“你为老哥壮胆儿”等话几乎成了口头禅。尽管我有时苛责他“谨小慎微”，但是，他已经养成多年的谦和逊让的习惯，确实是一种高尚行为和一种人际交往的美德。凡是和名超先生有过些接触的学界同仁们都对他这种表现感服和敬佩。

名超先生的谦逊表现在敬业处事方面则是一丝不苟、细致周详、责任感甚强。1983年新年，为了接待日本研究生山下女士，连续寄来三封信和发来一封电报，精心制定了接待计划、方案，凡是能想到的几乎都做了准备。1987年8月下旬，为了安排中日合作项目在哈尔滨的接待及交流事宜，也是接连三天写来三封长信，把方方面面的考虑和采取的大小措施也一一道尽，让所有读过这些信的人都对如此高度负责的精神表示钦佩并肃然起敬。在我和他交往的多年中，努力从他的道德和文章中学习他为人谋而忠诚不二的态度；学习他为学术研究求实专一的作风。真是受用无穷！

名超先生作为我亲缘上的兄长，事业上的尊长，道德风范上

的师长，当之无愧！我如今失去了这位亲密无间的挚友，不免常常陷入事业领域的某种哀伤的孤独！每当我继续展开“雪国史诗带”的构想时，名超先生那洪钟般的话音便在耳边响起，飞扬的神采便在眼前浮现！此刻，我便觉得失去了自我，只有名超先生的活生生的存在。

我纪念他，永不忘却；永不能忘却，也永不想忘却。

1994 年立夏到小满

忆马名超先生

宋德胤*

贾之先生从北京给我寄来了《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年—1966年)〈民间文学集〉》上下两大册,深蓝色的封面,古雅庄重,淡淡的油墨香扑面而来,惹人爱不释手。我欣喜地展开目录细读,见我们黑龙江省入选作品的作者有马名超、隋书今、关守中、黄任远,还有我。作品能被选入“拔萃”本确实是一件幸事,但当我的目光触到马名超先生的名字的时候,心中顿时涌起一股莫名的悲哀——马先生走得太早了!他欣逢盛世,我省有多少民俗、民间文艺采录、研究的宏伟规划正待只争朝夕,他却遽然离开了我们!“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这真是千古的憾事。

应该说,在我们这片黑土地上,马名超先生是民俗、民间文艺较早的拓荒人。他于50年代中期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拜我国著名民俗学家、民间文艺学家钟敬文教授为师,学成归来后,在哈尔滨师范学院讲授民间文学课。先生是最热忱的播种人,对劳动人民所创造的、散发着浓郁的黑土芳香的民俗、民间文艺,他饱含着深切的挚爱情感。60年代初,他在有关领导的支持下,便大胆地把知名的民间艺人请上了大学讲坛,让学生真切感受到来自民间的原始、质朴的群众艺术。当时我正在师院中文系学习,有幸聆听了马先生的热切教诲。先生在学术研究中的开

* 本文作者系中国民俗学会常务理事,牡丹江师范学院教授。

拓精神令人佩服,他正是以自己的艰苦执着的努力,来磨平学界的那些偏见和无知。我辈能步入民间文艺学界的门槛,马先生是我们的引路人,是我们可敬的导师!

先生生前常对我讲:“民间文艺学的富矿是在民间。”他不做纯粹的书斋式的研究,而是特别重视脚踏实地到民间去采风问俗。还是在50年代的中期,为了挖掘宁古塔、镜泊湖一带的民俗、民间文化,他会同刘魁立先生,顶风冒雪,奔走在茫茫的渤海故地,雪夜专访民间故事讲述家“傅二锄杆”。一位高等学府的先生盘腿端坐在农家老乡的热炕头上,满面的真诚、凝重,在那閃閃爍爍的油灯下,一字一句地记录着农民故事家的讲述……此情此景多么让人感动!

郭崇林君在悼念马先生的诗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先生毕生力倡实践,足履遍踏北疆山水,搜访民俗、民间文学瑰宝。亲自采录的作品及发表有关论述逾百万字,‘田野考察方法论’、‘北亚史诗带比较研究’学说令国内外学界瞩目。更有遗存的百余本田野踏查笔录,斑斑蜡痕,点点雨滴,犹在眼前,价值实难估评。”此话绝非溢美之词,马先生治学重实践,这是深受钟敬文先生的濡染的。钟老力诫弟子治学要“真刀真枪”,不染虚名,不凭主观臆断。今春去京都拜望钟老,当谈及马名超先生猝然逝去时,钟老不禁为之潸然落泪。听我讲到马先生留下田野踏查笔录一百零五本时,钟老说:“这是很宝贵的,应组织人很好地整理,他没来得及做的事,让后人做吧。”

马先生致学严谨,他的田野踏查笔录生前是轻易不肯拿出来示人的,原因是这些可贵的资料尚未来得及全面梳理。但有一次和先生相见,谈起田野踏查的方法问题时,马先生曾把他的笔录让我翻看,他写得一笔清秀的好字,有一首刚刚采录的时政歌谣,我至今记忆犹新。先生笔录注重科学的立体描写,讲述人、流传背景、异文、流传带,记述颇详。虽然现在搞科学研究难,出版

更难,但我相信先生的笔录,他的家人或弟子将认真保存并加以整理,终会奉献给学界的。

马先生的作品被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有:赫哲族长篇“伊玛堪”讲唱《满都莫日根》、与黄任远共同搜集整理的赫哲族神话《天河》、鄂温克族民间故事《不怕磨难的巴特尔桑》。

一个人的价值取向,在于他自己的追求,但他的自身价值终究能实现多少,还需要后人的认同与评说。可以说马先生生前的夙愿实现了,他的汗水并没有白流,因为这滴滴汗水已融进了中华民族文化的长河之中。马先生的在天之灵会感到由衷的欣慰的。

谨以此文深切悼念先师马名超先生!

白山黑水，祭吊师魂

郭崇林*

1991年10月2日晨6时，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黑龙江省民族研究学会副理事长、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常务理事马名超先生——我的恩师，因患肺癌，竟溘然与世长辞了！我几乎难于接受这突如其来的残酷现实。近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每当静坐下来，读着一封封来自国内外的唁电、唁函时，便不禁怦然心恻；目睹先生的遗物，更使我陷于深重的哀痛之中难于自拔。直至今日，先生的生平往事一桩桩、一件件，时常如潮水一般击打着我的思绪……

在和先生一起到乡村田野考察及共同外出参加学术会议的日子里，听先生讲述了他曲折的人生经历：先生1924年出生于忧患深重的旧中国。贫寒的家境和生活，使他自幼在姑爷和表姐夫的影响下，将质朴、挚切的情感与民间文艺融注在一起。“八·一五”光复不久，毕业于吉林高师的马先生毅然投身革命。

从此，他把毕生精力投入到民族、民间文化事业之中。无论是在辽阳师专，还是在哈尔滨师院；无论是插队落户，还是在省文化局戏剧创作室；也无论是在省博物馆考古队，还是在省民间文艺研究会，四十余年坎坷的个人经历都没有丝毫磨消他与民间文学的深切情感和从事民间文化事业的坚定信心。他以倔强

* 本文作者曾跟从马先生进行多年的调查、研究工作，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的意志，忘却自身的荣辱得失，走出一条新时代学者崭新的足迹

.....

先生毕生力倡实践。他不满足于日、俄、德、美“满蒙文化”探险家们的“经典论述”，满腔热忱地跋涉于他的第二故乡——黑龙江省的山山水水。从乌苏里江畔到额尔古纳河谷，从松花江中流直到边陲大小兴安岭；在赫哲族的网滩、鄂伦春族猎区，在鄂温克族牧场、满族的乡村……到处可以看到一位粗衣布履的关东大汉的身影，到处可以听到他浓重辽阳口音的爽朗谈笑和醇厚的歌声。在这里，他采录下一首首露珠一样清新的民间歌谣，一篇篇神采飞扬的幻想故事，一段段庄严沉郁的史诗讲唱……也正是在这里，他深深地被质朴素陋的民风习俗所打动而感慨万端，至深至切地体味着广大民众在深重的生产、生活压抑之下执著的理想与追求。

田野考察绝非常人想象的那么浪漫。多少人面对冰天雪地、遍地黄沙望而却步。风雪弥天的冬季，去县城几十里外的村屯，搭乘牛马车，一路上冻得不得不下车小跑，到达目的地，脚已冰凉得失去知觉；从前屯到后屯，一走一两个小时，雨季泥泞得分不出道路，拔不出脚；赶上春播，为不耽误正常的农活，和农友们一起下地，边干边聊；深更半夜跟从牧民的马队寻找迷失的羊群；为体察民俗，同猎户在山间丛林蹲坑打围，一泡就是几天；更不用说一日三餐粗茶淡饭，与民间歌手、故事家彻夜促膝交谈，残破不全的炕席竟磨破了脚踝……每到生活拮据的农家、猎户，先生必先用自己的钱买上烟酒、罐头。为了尊重民族感情，兴致所至，本来皮肤过敏不能喝酒的先生也要共酌共饮，然后忍着骚痒和头疼，记下精彩的一段故事或唱词。先生就是这样几十年如一日。是苦难中成长的经历和民族历史责任感，是抢救和挖掘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热切渴望，促使他翻山越岭，涉润过河，如鱼得水般沉浸在苦中求乐的艰难事业中。